

蒲松龄传

李永祥著

PUSONGLINGZHAN



刺贪刺虐入木三分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蒲松龄传

李永祥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3.1 济南

鲁新登字第3号

蒲松龄传

李永祥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话 615710

济南印刷四厂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7 插页15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329-0931-X

I·846 定价5.00元

序

徐北文

蒲松龄是受国人喜爱的作家，近来有人甚至称他为“短篇小说之王”，不仅与莫泊桑、契诃夫和欧·亨利比美，或不啻超过之。然而蒲氏的小说与现代短篇小说这一体裁是否相同姑且不论，他所处的时代、国家乃至文化心态也与这些欧美作家迥异，在可比之中自有其不可比者在。这就需要具体的分析，孟子所谓知人论世的方法，仍是一种正确把握作品及其作家的重要方法。在中国，蒲氏之前与蒲氏之后都没有和他比肩的人，不像诗坛中的李杜、苏辛，或书坛中的颜、柳、欧、赵那样，或并世或先后互相辉映；不幸在国外也是如此，中古时代的欧亚诸国，以及十九世纪以后的世界文坛，都没有类似蒲氏这样的文体与文风。无论《十日谈》、《天方夜谭》等等，亦如莫泊桑等的作品一样，都与蒲氏的《聊斋志异》不是一回事。在蒲氏来说，无须与古今中外的大家争高低而影响其独特的价值；在研究者来说，却因此而少了对比参照的方便，如不甘心于浮光掠影的评估，则只有以好学深思的态度去进行对“这一个”的陌生领域中的探索。

永祥先生的《蒲松龄传》是这种探索的新成就之一。他并未炫博矜奇以求新趋时，不是从概念，从某种理论定式出发，而是老老实实地从蒲氏身世及其环境出发，并以可塑性很强的观照态度，具体地真实地反映之。他能心明如镜，思路贯通，善于撷取重要的镜

头，而又意到笔随，以活泼畅达的文字来表现。我们读起来，感到并不是著者创造了一个传主，而是传主本人塑造了这本传记。传主个人的本色，即使因文献不足而不够细致，但却较真实地呈现出来了。正如一位肖像画大师，既把人物再现如真，同时也体现出画家特有的美学倾向和艺术风格。这本传记不仅以内容的翔实，而且也以文笔的优美而引人注目。

前人说作传记要有史才、史学、史识。文笔优美，盖是史才；资料翔实，盖是史学；唯独史识，却难于一语概括之。一个人的见识高低有时不凭读书多少，书呆子的见识不见得比老农老圃高；当然狡猾的市侩和政客也会机关算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连书呆子的见识都不如。总之，史识一词，比较难解然而可以意会。也许就是对于人情物理的融会和理解力吧，也许就是不过于拘泥，不钻牛角尖，不片面主观、刚愎自信，乃至旁证博引、生拉硬套名词而好为人师吧。我觉得本书对蒲氏祖先是否是蒙古、女真、阿剌伯以及汉人问题的阐述和判断上就是很通达的，也是有说服力的。又如对蒲氏的文风受晚明的影响，特别是竟陵派——《帝京景物略》的影响的论证，也是情通理顺的，尤其对作品的分析，不靠搬用什么主义之类的名词而立论。在大的社会背景方面，著者涉及到明末农民军的战乱，满族的进关主政，凶年饥馑，阶级矛盾以及科举不公等诸方面，既指出蒲氏的遭遇和不满，又说明蒲氏做为封建士人的在认识上的局限，合理适度，这种理解是很贴近人情的，因而是实在的。特别是著者在介绍传主的同时，并未忘记本书的读者，总是把传主时代的生活细节，如写考试就把考试的程序和运作，以及考生的具体感受都生动具体地交代清楚，从而使读者加深了对传主的理解等等。著者写作时既照顾了传主特点，又照顾了他的时代；既照顾了读者本身，也照顾了读者的此时此地的情况；可以说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对传主、对读者都能较充分的理解，这大概就是著者的

“史识”吧。

著者九年前的初稿我曾捧读，这次的补充修订稿，我也获先睹之快。随着时间推移。学术成果亦日益增多，著者的阅历识见也会更深厚精到，“后来居上”果为不虚。正如修订稿胜于初稿多多，相信著者的蒲氏之学今后定能结出累累的硕果，企予望之，是以为序。

1993.1.8 日于海岱居

目 录

第一章：满井水汨汨

- 一、病瘠瞿县 (1)
- 二、总管后裔 (6)
- 三、清寒门第 (15)
- 四、弱冠之年 (23)
- 五、郢中诗社 (30)
- 六、名落“孙山” (37)

第二章：幕宾与塾师

- 一、游幕淮扬(一) (43)
- 二、游幕淮扬(二) (50)
- 三、歧路彷徨 (58)
- 四、塾师生涯 (66)
- 五、艰难拮据 (76)
- 六、读书交游 (82)

第三章：壮盛之年

- 一、《志异》书成(一) (95)
- 二、《志异》书成(二) (110)
- 三、渔洋评跋 (120)
- 四、科场辛酸 (129)
- 五、高情逸志 (135)
- 六、寒屋著书 (143)

七、俚曲与戏文·····	(151)
第四章：垂老行	
一、忧愁风雨·····	(159)
二、终老一经·····	(168)
三、漕弊之争·····	(176)
四、老年丧偶·····	(182)
五、诗词文赋·····	(191)
六、与世长辞·····	(202)

病瘖瞿昙

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六日,夜已经深了,皎洁的圆月将它的清冷的光辉洒在大地上。那尸骨纵横的原野,烽烟弥漫的山峦,呜咽悲鸣的江河,残破凋零的村舍,都暂时沉浸在寂寥静默之中。

这时,山东淄川满井庄一所农家的院落里,灯火煌煌,人影幢幢,人们在默默地忙碌着,为了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

突然,北房里传出产妇痛苦的呻吟,孩子落地了。象任何一个刚刚降临的小生命一样,他呱呱地啼哭起来,宣告自己将要在这充满痛苦和忧患的世界里开始人生的历程。

他,就是我们这本传记的传主,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小说家,“枯槁当年”而“名扬千古”的蒲松龄。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他以《聊斋志异》这部脍炙人口的杰作,鸣于当时,流布后世,历久而不衰。

四十二年后,即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四月十六日,他的生母董氏已故世了。适逢自己的诞辰,念及先母,他写了《降辰哭母》一诗。诗中记叙了去年今日,他的母亲在病榻上闲话家常,提及他当年诞生时的情景:

“……

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

儿年於此日,诞汝在北房。

洗儿抱榻上,月斜过南厢。

逡巡复尔许，晓鸡始鸣窗。

念儿曾几时，儿女已成行。

言竟顾我笑，耿耿犹未忘……”

据说，蒲松龄诞生时，父亲蒲槃曾梦到一个病瘠瞿昙（和尚），偏袒着袈裟，走入内室，那左胸乳际，贴着一帖象铜钱一样大小的圆膏药，他吃了一惊，猛地醒来。这时孩子落地了，说也奇怪，左乳上果然有一块暗红色的墨痣。象这种托梦转生的说法，在当时是十分盛行的。例如，与蒲松龄同时的神韵派大诗人王士禛相传是高丽国王转世；《一统志》、《渊鉴类函》的总裁，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桐城张英（1637—1708年，字敦复，号乐圃），据云“母太夫人，尝梦有异人，自称王敦，至其家，觉而生子，名之曰敦哥”；而翰林修撰蒋虎臣，则说是其祖母“梦峨眉山老儒而生。”^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大致是当时的好事之徒，根据某人的一生遭际，故神其说，信口妄言的。

不过，蒲松龄自己在《聊斋志异自志》中也提及这一传说：

“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贴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且也：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显然，他这是借题发挥，以寄托和倾吐自己对贫寒境遇、坎坷遭际的愤懑和感慨。

夙因前缘之说，当然是荒谬的，然而，当蒲松龄降临到人世的时候，等待他的，倒确实是一条风浪险恶、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时代。

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内忧外患，日甚一日，已经危在旦夕了。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即蒲松龄诞生前两年，清兵大举入关，从临清渡过运河，攻占济南，明宗室德王被俘。清兵连破五十余

城，虏获人口四十六万，金银百余万两，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退师关外。

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当蒲松龄两岁的时候，清兵进犯锦州，明朝派洪承畴率八总兵步骑十三万前去救援。结果，松山一战，明军大败，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总兵祖大寿也献城而降，山海关外全部为清人所占。同年十一月，清兵又侵入关内，攻陷蓟州，转至山东，破八十余城，俘人口三十六万，牲畜五十五万余头，然后回师北返，明军不敢阻挡。

清兵这两次对山东的侵扰，烧杀抢掠，惨绝人寰，“百里火光不绝，各村焚掠殆尽”，“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余万”。^⑤惨痛的记忆铭刻在人民的心中，蒲松龄少年时大概是常常听到家乡父老谈起这两次浩劫的。后来，他在《聊斋志异》的《张诚》、《韩方》、《鬼隶》、《林氏》、《乱离》等小说里，反映了清兵的暴行。

当蒲松龄降临人世的时候，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领袖的农民革命战争也掀起了新的高潮。

崇祯十三年，即蒲松龄诞生的这一年，九月，李自成率五十名骑兵，从巴西鱼腹山突围，到河南发动饥民起义，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义军就扩展到数十万。此后数年，李自成率军攻洛阳，占襄阳，北取关中，建大顺国号於西安；接着又渡河破汾州，略太原，取大同，入宣化，抵昌平，终于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与此同时，张献忠转战于湖南、湖北、四川等省，一六四四年进驻成都，建立政权，国号“大西”。

明朝末年，蒲松龄的家乡山东，农民的反抗和斗争，也是前仆后继，风起云涌的。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以白莲教起义，“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郛城，俄陷邹、滕、峄，众至数万”。^⑥这次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其影响却深入人心，历久不灭，有关白莲教的事迹，四方流

传，甚至被渲染上神异的色彩。到了清代，白莲教依然是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有力的组织形式，曾多次发动和领导了规模很大农民暴动和起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白莲教》、《邢子仪》、《小二》就是以徐鸿儒起义为题材的。

崇祯末年，李自成大顺军势力已到达山东一带，例如，大顺军旗鼓将赵应元曾占领青州。山东境内农民纷纷响应。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以苍山、花盘山、抱犊冈一带为根据地的“九山王”王俊领导的起义军；有以濮洲、范县为中心的榆园军。这两支起义军在清兵入关之后，还长期坚持了抗清武装斗争。

俗话说：“大兵过后，必有凶年”，战乱和灾馑往往是一对孪生的灾星。蒲松龄出生之时，他的家乡灾情是相当严重的：

“（崇祯）十三年……五月大旱，蝗；冬十二月，大饥，人相食。”

“十四年夏六月，山东大旱，荐饥，盗大起。……”^④

后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刘姓》一篇中，对崇祯十三年前后的灾荒，曾做过生动的描述：

“初，崇祯十三年，岁大凶，人相食，刘时在淄，为主捕隶。适见男女哭甚哀。问之。答云：‘夫妇聚裁半年，今岁荒，不能两全，故悲耳。’少时，油肆前复见之。似有所争。近请之，肆主马姓者便云：‘伊夫妇将饿死，日向我讨麻酱以活。今又欲卖妇于我。我家中已买十余口矣。此何要紧，贱则售之，否则已而。如此可笑，生来缠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数，不足供逃亡之数。本欲两生，若卖妻而不免于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阴骘行之耳。’刘怜之，便问马出几何，马言：‘今日妇口，只值百许耳。’刘请勿短其教，且愿助以半价之资，马执不可。刘少负气，便谓男子：‘彼鄙琐不足道，我请如数相赠，若能逃荒，又全夫妇，不更佳乎！’遂发囊与之，夫妇泣拜而去。……”

这种令人触目伤情的惨状，当时是比比皆是的。

明朝覆亡时，蒲松龄年仅四岁，尚未晓事。待他成年后，清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渐趋稳固了。然而毕竟是“殷鉴不远”。他从父老的讲述中，了解到明朝的腐败，清兵的暴行，人民的痛苦和反抗，这对于蒲松龄思想的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看到《聊斋志异》中有不少篇章是取材于明末的，而在这部杰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封建统治的叛逆和斗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可以看做是明清交替之际那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动荡的折光和投影吗！

[注释]

(1)见《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王渔洋前身为高丽国王》、《张文端为王敦转世》、《蒋翰林》诸条目。

(2)见丁耀亢《出劫犯略》。

(3)《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赵彦传》。

(4)《山东通志·通纪八》。

总管后裔

淄川，清属济南府治，位于鲁中丘陵地带。这里“环邑皆山”，“率少坦土，尽是九曲羊肠，乡皆僻径，并无百里车辙。”^⑥山区耕作条件差，农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

蒲松龄的家在县城之东七里多的满井庄，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山村。村中有泉名满井，又名柳泉，是县中胜地之一。蒲松龄在《募建龙王庙序》中，对于柳泉明丽的景色做了生动的描述：

“淄东七里许有柳泉，邑乘载之，志胜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芳，酿增酒旨，淪增茗香，桑苧翁划试之，惊自上冷外，得未曾有也。深丈许，水满而溢，穿甃石，醺醺出焉，故土人又名满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折，听呼者牛马之。其出也，汇者渊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续，则泱泱然河矣。兰若外为泉，泉外为河，河外为山，山簇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儿孙列，圆如米聚，方如印覆，削壁开，丹嶂立，杂以垂杨绿柳，紫青缟白，浑无断际。河之阴一道，通南北往来。解赏者辄坐流连。冬之日，甃石为爨；溽暑行人，望泉投止，脱汗笠，解衣褫柳腰，则饮，则浴，则憩坐，坐顷，风颺唳，泉泠泠，自谓予蓬莱不易也。泉不知何人何年所创焉者，甃石不甚斧凿，为游人所坐，衣磨拂而滑之矣。泉旁柳大百围，为雨浸以濡而空之久矣。……”

泉畔本无庙，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僧人来存发愿修龙王庙，已经工料齐备了，但由于灾馑连年，不得不中寝。六、七年后，来存已死，他的弟子天性和尚沿门托钵，募集资金，修成了庙宇。可惜的是，泉边那棵围已丈余的古柳，已被人砍做柴薪了。庙成后，蒲松

龄曾为之撰写《新龙王庙碑记》一文。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灾馑，淄川一带，人口锐减。明开国后，进行了大量的移民，淄川居民，十之八、九是由河北移民，然而蒲氏却不在其列。他们是自元代初年就定居淄川的。据蒲松龄所撰《族谱序》云：

“……独吾族为般阳土著，古墓在邑西招村之北，内有谕葬二：一讳鲁浑，一讳居仁，并为元总管，盖元代受职不引桑梓嫌也。然历年久远，不可稽矣。相传倾覆之余，止遗遗孤，吾族之兴也，自洪武始也……”

按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淄川改为般阳路。元代的“路”是二等地方区划，属行省统辖。路设长官达鲁花赤及总管二职，管理该地区军民事宜。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而总管一职则由色目人或汉人担任。

蒲鲁浑与蒲居仁何时担任总管，二人是何关系，皆不可考。蒲鲁浑之名，显然不是汉人的名字，故而，关于蒲氏的民族成分，引起人们的猜测和探讨。目前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为汉人说。蒲松龄在《族谱序》说蒲氏为“般阳土著”，又云“元代授职不引桑梓嫌”，言下之意，是说淄川是其祖籍，当然蒲氏也就是汉人了。然而，其祖辈却只能上溯到元初，而任般阳路总管这两位祖先的来历和生平也因“年代久远，不可稽矣。”加之蒲鲁浑之名姓非汉人名姓，故而，这种含糊的言辞，是不足以证明蒲氏为祖籍淄川的汉人的。

一说为蒙古人，但元朝制度，地方主要长官达鲁花赤为蒙古人担任，总管为副职，是不由蒙古人担任的。

一说为女真人，女真族姓名音译多有记作蒲卢浑或蒲鲁浑的，蒲鲁浑在女真语中系“布囊”的意思。然而女真族统治北部中国长

达百余年，如蒲氏在金时已居淄川，县志或族谱中是会有所记载的，但却未见踪迹。女真人固然有乌延蒲鲁浑，居察蒲鲁浑等名，但后来汉化以蒲为姓却未见一例。

一说为阿拉伯血统的回族人：

阿拉伯人与中国通商，可以上溯至七世纪的东晋初年，至唐宋而大盛。广州、交州、扬州、泉州等地自唐以来，就是通商之地，有大批阿拉伯商人来此经商。北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年）密州也设置了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密州辖境相当于今之山东省沂水、莒南以东，胶县、安丘以南地区，治所在今之山东诸城县，当然也有大量外商（包括阿拉伯商人）到此经商。

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者，多侨居各港埠，或与当地人杂居，或划定特定区域居住，谓之蕃坊。例如宋代广州“有海獠杂居”，“海獠”，即指泛海而至的外籍商人（或谓海獠即阿拉伯之音译），泉州蕃坊在泉州地近晋江处。密州情形未见记载，想也不外此例。

据南宋岳珂所著《桧史》卷十一记载：“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蕃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憚于复反，乃请於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逾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

番禺即今之广州。杂居的外商中，最豪富者以蒲为姓，《桧史》说他们是占城贵人，占城，也称占婆或占波，在今之印度支那半岛。阿拉伯商人泛海来华，先至印支半岛占婆，再至广州，故时谓之南蕃。据《宋史》卷四八九记，占城“风俗衣服与大食国相类。”可知当时侨寓占婆的阿拉伯商人已成为当地主宰。岳珂《桧史》中又记载了番禺海獠的风俗和信仰。

“獠性尚鬼而好洁。”

“平居终日，相遇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名如中国之佛，而实

无象设，称谓聾牙，亦莫能晓，竟不知何神也。”

“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蛙炙梁米为一，洒以蕃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於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润而已。群以左手攫取，饱而涤之。”（按，应为右手攫食，左手为秽，《程史》误）

这些都是阿拉伯伊斯兰教风俗，另据北宋朱彧《萍州可谈》记广州蕃坊饮食习惯：

“至今蕃人但不食猪肉而已……

至今蕃人非手刃六畜则不食，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

中亚和西亚商人多年侨居中国者，唐以来即有。唐人薛用弱所撰《集异记》中记载：司徒李勉开元初年在睢阳曾遇到一侨居中国二十年的波斯商人。《宋史外国传》六（卷四百九十）记北宋仁宗至道元年（995年）大食国船主蒲押陀黎言：“父蒲希密，因缘射利，舶至广州，迄今五年未归”。到了北宋末年，已有大批定居五世以上的蕃商，政府还特为发布了如何处分他们的财产的诏令。《粤海关志》卷三引《宋会要》文：

“政和四年（政和为宋徽宗年号）五月十八日诏，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遗嘱者，并依户绝法，仍入市舶司经管。”

这些长期居住中国的蕃商，和当地居民通婚，学习汉人的语言和文化，逐步汉化，有的甚至科举应试。北宋初年钱易《南部新书》记：

“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

色目人是塞外人，西域人的总称，唐时即有此名目。北宋时这些应试的色目人是否包括汉化的阿拉伯蕃商的后代呢？按理是应该包括的。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一位官居资政的人，叫蒲传正，他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洗浴习惯。据明谢肇《文海披沙》记：